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7)03-0111-04

从多元系统论看文学转型期的归化异化

谭素琴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多元系统论指出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时,往往采用异化策略,反之则采用归化策略.本文拟以多元系统论的归化异化观为理论依据,以中国文学现当代转型前后的翻译文学为主线,探讨文学转型期与翻译文学的交互关系,展现归化异化动态的历时更迭.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现当代转型;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1 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归化异化辨

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形式,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翻译过程中,当遇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异与对抗时,是应该遵循原作的精神和形式,如实反映源语文化中的异国情调呢,还是应该按目的语的文化预设和审美期待,对外来文化中的差异进行消解呢?抑或是以折中的方式对两种文化的差异做出协商呢?归化和异化的提出即是建立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作为翻译实践中的策略选择,对归化异化论的研究不能无视具体的时代特点,“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孤立地谈论归化与异化是不全面的”^[8],因为影响翻译实践的不只是语言的内部差异,更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元系统论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理论,首创性地将翻译现象同时代语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立体化的思想维度,动态地呈现出一幅政治权力,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历史图景.作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翻译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内部或外部系统间的权力角逐,其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着它在文学系统内部占有的位置,而它位置的改变很大程度

上又影响着归化异化的策略性选择.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套用本国文学系统中的现成模式,而是努力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引进外国文学系统中的新话语,也就是说,译者主要考虑译文的充分性,采用异化策略.相应的,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在本国寻找最佳的现成的二级模式对外国文本进行本土化改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用归化策略.

2 翻译文学史上归化异化的历时演变

为使问题的分析更直观,更有代表性,本文拟将讨论的时间范围定格为二十世纪以来的现当代中国,同时对该时间段内的文学发展进行一次阶段性划分,因为“文学史的分期必然地包含了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视角地改变”^[3],而文学观念和研究视角的转变实际上预示着文学文化的转型.文学文化的转型将直接影响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进而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文学转型期翻译策略的应用问题,主要涉及本土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因此从世界文学格局出发,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碰撞为分期原则,将

收稿日期:2007-02-16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为课题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编号为06skwy01

作者简介:谭素琴(1977-)女,四川内江人,硕士,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http://www.cnki.net>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分为两个转型期：“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和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当代转型。

2.1 文学现代转型期的归化与异化

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包括了晚清和“五四”两个阶段，晚清的文学革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不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转型，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话语，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转型^{[4](P81)}。作为两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晚清和“五四”的翻译文学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实现特定社会中的文化诉求。

2.1.1 晚清：归化翻译为主

晚清是腐朽的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没落但封建文化仍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当时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增强本国军事实力和国防能力，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然而，尽管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不如西方列强，却抱着文化自恋的心态，自足地沉浸在传统文学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即便是严复、梁启超之类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无法抛弃对传统文学的眷恋之情。这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形态，也是晚清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客观上来看文学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衡的。晚清政治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等一系列改良，但传统文学系统并未像政治那样发生急遽变革，仍然牢固地占据了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相形之下，翻译文学仍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按多元系统论的解释，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边缘位置时，对异域文学的译介也应该强调可接受性，即普遍采用归化的方法。

事实上，晚清时期归化方法在翻译文学中大行其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但他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一标准进行翻译，相反却以译例言，序跋和译著中加按语的方式对原文进行中国式的解读和评论，甚至进行大规模的改写。《天演论》第一章开头那段文字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原文第一人称的“我”戏剧性地变为第三人称的“赫胥黎”。译文气势昭昭，一句呵成，但无论从口气和形式上都与原文大相径庭。而林纾，虽然具有一定的世界文学意识，在语言文字上创造性地融古文和“欧化”语言于一炉，但他基本上也采取了归化译法，以传统小说中的场景，章回体小说的套路，对异域图景进行中国式的想象，将陌生文本熟悉化，再造了中国读者局内人的文学体验。

2.1.2 “五四”新文学：异化翻译为主

“五四”时期，传统封建文学文化遭到了空前挑战和质疑，陷入全面的合法性危机，迫切需要引入某种新鲜的文学文化观念代替原有系统的位置。在新思想，新文化引进的过程中，翻译甚至一度超越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文学家如胡适、鲁迅、茅盾、刘半农以及思想家、政治家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纷纷投身于翻译当中，积极译介了一大批西方文学名著，除了英美两国外，还介绍了法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8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德国24部、英国21部。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文学活动中，翻译成为一种主流，与此同时，原有文学传统内部进行的创作活动，几乎没有出现过。这就表明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相应地，翻译作品的文学形式库应强调源语的文化规范，打破本国的文学传统，引进新的文学形式，建构一套新的文学话语，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事实上，“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也正是通过带有异国风味的“欧化”语言，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促进了中国文学由传统经典向现代化的转型。

第一、从翻译文学的语言来看，为了引进新的文学语言，重构中国文学的现代话语，翻译文学本着“尊西求新”的原则，保留了源语的文学传统和语言特色，引入了大量“欧化”的句式和词汇，导致了中国文学语言由古文向现代白话文的完全转型。关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对新文学话语形成的重要作用，瞿秋白曾这样论述道：“翻译一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6](P216)}。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汉语的现代白话。

第二、从翻译文学的文学形式库来看。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体裁非常有限，形式单一。小说基本都采用章回体，描写手法上也较为刻板，缺少西洋小说中人物肖像等细致入微的个性描写，也没有丰富的文学流派。“五四”时期，通过欧化语言译介的翻译文学，引入了英美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法国的浪漫主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话语。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并不是译者随性所至，想当然而作出的一种纯粹主观的选择。译者的这种选择很大程

度上受到客观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鲁迅反复提到‘欧化’语言的采用并非想当然,鲁迅也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2]当然,我们说文学转型期异化策略占主导,并不意味着归化译法不存在,一定程度的归化将有助于文学新规范的确立。

2.2 文学当代转型期的归化异化

2.2.1 改革开放前:归化翻译为主

“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翻译文学一片众生哗然,西方文学话语在1927—1937年这十年中得到强化,并在1937—1949年的战乱岁月里开始沉寂下来。文学现代转型的完成,将新文学系统的规范确立并稳定下来。根据多元系统论,这时的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应处于边缘位置,其文学模式往往是二级的,转化为一股僵死的保守力量。因而翻译实践中,译者将更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对原文的陌生性进行本土归化。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新生的人民政权基本上受到西方各国的排挤和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土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弱势状态,但客观上要求在翻译中重塑民族自信,实现独立自强的民族身份诉求,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客观上也决定了翻译文学应更多关注译作的可接受性,以归化的译法彰显不屈的民族精神。

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纲领性报告,主张将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他说:“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学,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2]这就要求译者首先要深刻领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过程,努力实现“移情”,将自己和原作者合二为一,使翻译出来的译文不像译文,而是“原作者用另一种文字写自己的作品”(同上)。该报告反对“翻译腔”,确立了文学翻译应以“归化”为主的原则。

这个时期有关“归化”译法的论断,尤以傅雷和钱钟书为代表。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陈福康,2000:391)。傅雷的“神似”论表明文学翻译时,忠实传达原作的精神比保留原文

的形式更为重要。钱钟书是主张“化境”的,在论《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他写道:“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迹,又能完全保持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7]。

由此,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主张根据目的语的特点,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前提下修改其语言形式,译作不再是译作,变成了融入外国文化体验的本国语写作。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就是一部高度归化的翻译作品。原作中带有明显异域情调的人名,地名甚至某些场景,都被译者赋予了典型的中国色彩,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写作。又如杨必先生翻译的《名利场》,虽然也注意到了原文的异域文化特色,但其归化手法也十分明显。如godfather译为“干爹”,godson译为“干儿子”等,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2.2.2 改革开放后:异化翻译后来居上

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带入了与世界各国碰撞的涡流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文学文化的发展客观上无法避开其他异质文化的影响,主观上以狭隘的民族情绪为挡箭牌,在画地为牢的自我中心里沾沾自喜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可能的。翻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抵御“他者”文化,而是强化人们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增加彼此的理解,建立起一种包容欣赏的文化心态,实现不同文化的共生共存。为此,异化翻译在今天是很必要的。潘学权认为其必要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经济,文化交流的因素;丰富语言,文化表现形式的要求;读者求真,求美的要求;促进外语学习的要求^[5]。事实上,异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策略的必然还受到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影响。理论上说,不同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应是平等的,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然而,我们看到,当权力和意识形态渗透到语言文学中时,翻译就不再是纯粹的跨语际活动,而是以语言为载体争取权力平等的政治斗争。

自现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学形成的大多元系统中,中国文学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被视为“无声”的小国文学,弱势文学,这种尴尬的境地使中国文学无法平等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一度处于“失语”状态。佐哈尔认为,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往往以外国文学为楷模,“要完全以引进外国文学来图强求变”^[1]。事实上,纵观我国当代的学术研究,几乎鲜有

本土自创的理论话语。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文学批评,绝大部分都直接来源于外国。可以说,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对外国文学文化中异质成分的吸纳,是继“五四”以来的新一轮高潮。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文化要参与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化交流中,首先必须学习掌握好西方的语言——英语,了解西方文学所能欣赏的话语形式,进而以这些话语为中介,传播中国的文学文化,帮助中国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9](P14)}。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目前为止,中国无人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缺少具有世界意识的优秀文学作品,而是缺少向世界介绍优秀作品的理想媒质,造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当代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如果要向边缘走向中心,所采取的方法不应是以保守的文化心态捍卫本土文学传统,而应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学话语,并以他们的话语将优秀的民族文学文化介绍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语境下,尽管有些译者为了抵御西方强势文学对民族文学的侵蚀,采取了“阻抗式”的翻译方法,力图减少外来文学文化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努力是消极的,无法阻挡来势汹汹的文化全球化这一客观历史潮流。与其被动地阻抗,还不如主动吸收西方文学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利用,从更广阔地层面参与到西方世界的对话中去。换句话说,异化方法不仅仅是当代翻译文学无奈的选择,也是中国文学争取话语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异化翻译应努力保持公正的文化心态,对外国文学文化的异质成分不盲目崇拜和偏爱,以免在无意识中走向全盘西化的歧途,背离传播,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学文化的初衷。

3 结语

佐哈尔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的有机结合,不仅拓展了研究范围,而且对翻译现象存在和发生的深层原因做出了普适性的归纳,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就中国翻译文学而言,多元系统论为进现代及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归化异化的选取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理据支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总是伴随着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主导地位的改变。有关多元系统论对归化异化策略的适用性,张南峰这样评价道:“假如把多元系统论应用于中国的翻译研究,我们或许能够解释许多现象,例如严复、林纾为何用达旨、译述的手法而成功,鲁迅为

何主张硬译,当代流行的规范为何与以前的不同……翻译规范因应社会的需要而变化,不同的规范,只是为了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或者社会的需要而变化”^{[10](P117)}。

注释:

① 复旦大学学报2001年刊发的“文学史分期”专题讨论引起了学界该问题的关注。李茂民发表于《齐鲁学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总结了四种分期方法:一是传统政治视角的分期方式,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根据和标志;二是从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或审美视角出发,以“20世纪”的概念连接起“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的机械分割,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三是从世界文学格局出发,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作为分期原则,把1919年五四文学第一次世界的开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把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第二次向世界的开放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四是把五四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的价值为中心”的潮流取得了主导地位。由于文学史分期表现了文学观念的嬗变,标志着文学的转型,因此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同样适用于文学转型期的划分。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文学转型期翻译策略的应用问题,主要涉及本土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故本文采信了第三种分期方法。

参考文献:

- [1] 埃文-佐哈尔.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A]. 庄柔玉译.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3] 罗兴萍.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6): 17.
- [4] 刘忠.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时间分期[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5): 81.
- [5] 潘学权. 异化: 全球化时代的翻译策略[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98-99.
- [6] 瞿秋白. 关于翻译—给鲁迅的信(1931)[A].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7] 钱钟书. 钱钟书文集[C]. 北京: 中国古籍出版社, 2004.
- [8] 孙会军. 归化与异化—两个动态的概念[J]. 外语研究, 2003, (4): 60.
- [9] 王宁.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0, (1): 14.
- [10] 张南峰. 导言: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A].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下转第122页)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the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GAO Dan-ka, GAO Cui-yuan

(Sci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has its base in the love experience of its writer. As the creator and also the center of texts, those scholars narrate stories in the light of man's aesthetic value, which shows the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elite of their society, those scholars, in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openness and freedom, surpass the value of their time and pursue an ideal relationship with both love and harmony. Therefore,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reveals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soul by its scholars.

Key words: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man of letters; relationship

(上接第 114 页)

Polysystem Perspective: The Diachronic Alter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Literature

TAN Su-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Polysystem believes that domestication is usually adopted when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 system and foreignization is employed when at the periphery in a specific societal—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ition and the diachronic alter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y taking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tioned transition on the basis of polysystem theory.

Key words: polysystem theory; translated literatur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